

【中】王晓林 (**Xiaolin WANG**)

个人简况

王晓林，生于1951年，天津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首席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经济学范式和科学发展经济理论。

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天津市河西区珠江道25号

邮编：300222

电话：022-88186268（办）

移动电话：13612100569（天津）；13522349410（北京）

E-MAIL: tjufewxl@yahoo.com.cn

市场经济复杂性的挑战 ——华尔街金融危机所凸显的新古典范式窘境

【中】王晓林

内容提要：华尔街金融危机震撼了世界经济，更凸显了新古典范式的简单性缺憾。若从复杂系统科学范式来分析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它无论作为开放的自组织系统，还是作为属人的演化系统，均具有复杂性，如非设计性、属人性、非均衡性、不确定性、难以预测性等等，它们往往超出经济理性控制之外。新古典范式拒绝承认市场经济的这些重要属性和基本方面，只致力于揭示其均衡性的简单方面，而忽视复杂系统科学范式在现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演化经济学、混沌经济学中的深入渗透，不仅其“物理学艳羨”已陷入尴尬境地，而且其解释和指导现实功能之信誉亦逐渐丧失殆尽。这些教训应当引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深刻反省，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有所启示。

关键词：华尔街金融危机 自组织生成 不确定性 经济理性控制 属人复杂系统

一、引言

华尔街金融风暴危及整个世界经济，甚至迫使美国政府“十天改写资本主义”。然而，无论布什政府如何作为，正像2008年经济学诺奖得主克鲁格曼近年来所揭示的那样，其政策目的多是为了其背后的大财团谋求利益，而且一直在向群众撒谎。

(Krugman,P.,2008.)伴随着危机的生成和蔓延，一度“风光无限”的新古典范式亦愈益陷入窘境。主流经济学家对此次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危机的对策莫衷一是，遑论对危机的预测，进而更凸显其进退维谷的尴尬。个中缘由何在？这是理应引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乃至经济学界高度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张作云教授认为，崇尚西方经济学的国内外学者将金融危机及其灾难性后果归结为“政策失误”说，“金融活动与物质经济活动分离”说，“投机心理动因”说，抑或“制度根源”说等只停留在现象层面，而未揭示其本质，因此均不足取；真正的根源在于市场经济的根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制的局部性（资本主义条件下是其私人性，社会主义条件下则是其多样性）的矛盾。(Zhang Zuo-yun,2008.)刘明远博士指出，“非理性的次贷行为”说，“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说，“格林斯潘时代错误的货币政策”说，“诚信缺失”说等，是在用具体原因取代根本原因，有些甚至是因果倒置；而根据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此次危机则直接源于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以及过分扩张的信用链及其中断。(Liu Ming-yuan,2008.)这些分析切中要害，发人深省。

从西方经济学观点来看，较有见地的学者也提出一些值得反思的观点。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指出，“软预算约束”（制度性的是指有限责任公司、中央银行和“重组”破产法，政策性的则是指资产证券化）悖论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质的特征；而它的现实存在和不可或缺，在理论上将成为新古典范式无法克服的障碍。（Cui Zhi-yuan,2008.）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认为，“华盛顿共识”给发展中国家开的药方等于说：“按我们说的去做，但不按我们做的去做”；监管者和经营者为逐利而制造风险是此次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布什政府目前的改革并不能保证我们不会再次遇到类似危机。（Stiglitz, J.,2008.）凯恩斯传记获奖作品的作者、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名誉教授斯基德尔斯基则指出，此次危机涉及的是经济学领域里最古老的、至今仍争议未决的问题之一，即市场经济是“天然”稳定的，还是得通过政策来稳定它？而经济学主流观点和市场经济模式则在自由主义周期（政府调控主导）和保守主义周期（自由竞争主导）之间不断循环；经济模式的轮替流行周期，说明了经济学离一门科学的距离有多远，人们很难想象在任何一门自然科学中，正统说法会在两极之间摇摆。（Skidelsky, R.,2008.）上述观点虽未深入涉及危机的根源，却蕴含一个重大问题：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生成和蔓延，实践中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矛盾的爆发和危机，理论上也是新古典范式内在矛盾的凸显和危机。

迄今为止的人类经济活动实践表明，较之于依靠传统或依靠行政命令等组织经济生活的其他方式，市场在实现资源的高效率配置方面占据优势。目前愈演愈烈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就是市场经济体系的全球化。中华民族直面经济社会的急遽转型，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既然如此，就十分有必要深刻把握其本质属性。然而，人们透过新古典范式所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幅图景，它似乎只是某种封闭的热力学系统，时时处处都在“本能”地趋向均衡，完全可以用还原论的力学模型来加以描述。笔者不揣浅陋，拟参照国内外学者有关阐释，在学界公认的市场经济乃是开放的自发生成系统之基础上，对其本质上复杂性的一面加以剖析，同时也结合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启示，对新古典范式的致命缺憾略作评论。

二、市场经济：开放的自组织系统

市场经济是开放的自发生成系统，或许是学界的一个定论。自古典时期到现代，诸多观点迥异的经济学大师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并无根本分歧。斯密在创立经济学之初，就提出用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来界定市场经济。在他看来，市场经济是顺应自然的自动调节系统，而只要顺应自然秩序和人之本性，通过利己心的驱动和自由竞争及“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就不仅能满足个人的最大利益，还能为社会积累日益增长的财富，因而它永远是面对世界和未来开放的（Smith, 1974）。马克思未必同意斯密的所有论断，但也确认：“我的观点是：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1975, p12）而无论从客观趋势还是从有路径依赖的自生成之角度来看，“自然历史”与“自然秩序”均有相通含义可以共享。马歇尔宣称“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的前提，乃是“自然不能飞跃”（1964, 均见P18）。凡勃伦

在1898年发表其经典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之后，随即在1899年的《有闲阶级论》中，也采用“自然淘汰”、“适应过程”来描绘人类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的演进（1964，p138）。尽管在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上，熊彼特与斯密相似而与马克思相左，但其《经济发展理论》（1990）从动态和发展的观点分析创新和市场经济的演进过程时，也有与马克思相通之处。^a其后，哈耶克（1997，2000）论证其“自生自发秩序”和“扩展秩序”理论时，也是以市场经济作为范本，并因此获得世界性赞誉。无独有偶，许多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也描述了作为“世界体系”的市场经济是“自然历史”的产物，是“不断改造自身结构”的过程（Braudel，2002，p6，p669），指明它是“经过缓慢而细微的演变”的自然渐进过程（Wallerstein，1998，p26），并指出市场经济“最初只不过是一系列可能性中的一个”（Duplessis，2001，p15）。无论如何，市场经济不是人类刻意设计的结果，而是在无人能够预知其后果的情况下，在漫长的岁月中自发进化而形成的，因此，就它是一个开放的自然生成系统而言，似乎并无人能对此提出有说服力的异议。

经济学家称谓市场经济自然生成的术语，从斯密的“自然秩序”逐渐转变为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在后者看来，还可以用“自生成秩序”或“自组织秩序”等术语代替之（Hayek，1997，p7注①）。这就与现代复杂系统科学范式的自组织理论不谋而合。正如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导论”中所表述的那样，这个“经济学所熟知的古老观点”，“即我们的价值和制度不单是由既往的原因所决定，而且也是一种结构或模式不自觉地自我组织的过程之一部分。这种观点，不仅在经济学中，而且在一个广大的领域，即今天人们所说的生物科学中，都是正确的。这种见解不过是一个不断成长壮大的理论家族中的第一个成员，它在说明复杂结构时是着眼于某些过程，它们超越了我们服从所有各自环境的能力，并且对这些环境的具体表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最初开始工作时，感到自己在研究这种自我维持秩序的高度复杂的进化形式方面，几乎是在孤军奋战。但是在这段时间，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它们有着形形色色的名称，如自发生成论、控制论、内生平衡、自发秩序、自组织、协同论、系统论等等——变得如此之多，使我……只能说是为一个不断壮大的潮流尽了绵薄之力。”（2000，p4-5）

既然人们对于市场经济自然生成且具有开放性的事实本无异议，并且对此问题作过权威论证的哈耶克也承认其研究与复杂系统科学相通，我们就可以用复杂系统科学范式的概念，把市场经济体系界定为开放的自组织系统。复杂系统科学或自组织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现代科学新范式，已经对现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演化经济学、混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产生深远影响（Chen

^a 熊彼特夫人伊丽莎白指出：“熊彼特和马克思有一共同点，那就是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想法。在他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里，熊彼特试图提出‘关于经济变迁不单是决定于推动经济制度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各种外在因素的纯粹经济理论’。在这一著作的日文版的序言里，他说‘读者可能会立即明了一点，我在开始时是不清楚的，即这一概念和这一目的（指熊彼特自己的）是和构成卡尔·马克思经济学说基础的概念和目的完全相同的。实际上，马克思之所以有别于同时代或前时代的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定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看法。……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才又都折回到他这里来，尽管他们可能发现他有许多可以批评之处。’”（参见熊彼特，1965，第2页）

Ping, 1988,2004; Day,etc.,1996; Briggs,Peat,1998; Laszlo,2001; Doper,etc.,2004; Foster,Metcalf,2005; Jia Genliang 2004) 如果说经典科学关注的研究对象是静态的“存在”的话,那么,自组织理论或复杂系统科学关注的研究对象就是动态的存在即“生成”,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演化生成”,即有路径依赖的、推陈出新的生成。恰如伯格森所言:“真正的进化论着眼于现实的生成和发展。”(2004, p5) 不难看出,市场经济作为开放的自组织系统,也是一种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结构。作为一个非封闭系统,不论在过去、现在或未来,它都不得不在系统内部并与外部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尤其是信息的交换,因而始终处于不断演化的进程中。有朝一日,倘若这种交换由于不可抗拒的条件而停滞,那就是该系统的死寂或崩溃之时。在其演进的过程中,时间之矢实质上是不可逆的。因此,复杂系统科学范式的分析工具,是适用于分析市场经济之本质属性的。(Wang Xiaolin,2006)

何谓复杂性?据麻省理工学院Seth Lloyd统计,至少有31种不同的复杂性的定义(Hao Bo-lin,1999)。由于复杂性乃现代科学最复杂的概念之一,而多样、差异、变异又是复杂性固有的内涵,若只接受一种意义下的复杂性,或许就否定了复杂性本身(Miao Dong-sheng,2000)。尽管如此,出于论证的逻辑需要,我们还是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理解复杂性。表现出复杂性的事物一般是有巨量的、异质的、相互作用的单元构成的系统,其各单元、各子系统和各层次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其运动过程具有不可逆性且对初值具有很强的敏感性,表现为自组织的(具有一定的自组织核心)、开放的、远离平衡的、适应性极强的、难以预测的、不可还原的种种属性。哈耶克(2000)认为,复杂性的本质要求我们不能把它全部归结为认识过程的不充分性,因为,伴随着人不断扩展的“已知”的,必定永远是人愈益自觉意识到的更多的“无知”。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复杂性的客观存在,它不会因为科学和哲学认识论的发展而消失。

就市场经济自身而言,如果从它与生俱来就具有自发性、开放性和适应性出发,人们就不能不承认它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巨系统,本质上是复杂的。在这里,自发性主要指谓非设计性、无总体目的性等。按照与休谟(David Hume)齐名的苏格兰学者弗格森在《文明历史随笔》(Ferguson, 1767, p188)中的说法,市场经济是“人类行动的结果,但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参见Doper,2004, p215) 斯密随后将经济制度分为“人为的”和“自然的”两大类,认为市场经济属于“自然秩序”,仿佛“一只看不见的手”,其产生和演变均非人类有意识的计划而为。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来诠释就是:“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Engels,1995, p697) 另一方面,与马克思唯物史观截然对立的哈耶克则从个人主义方法论出发,通过对“建构论理性主义”的批判和对“进化论理性主义”的论证,以及对“目标的统治”与“规则的统治”的区分,同样有力地论证了市场经济的非人工设计属性(Hayek,1997, 2000)。G.P.O'Driscoll甚至认为:“自生自发秩序(更确切地可以称为‘非设计的秩序’)原则,可以被视为经济学的第一原则。”(参见Hayek,1997, p8) 而非设计性与不确定、分岔、新奇、变异、多样、差异、难以预测等复

杂属性的内在相关，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开放性作为市场经济的另一基本属性，也与复杂性有不解之缘。首先，它与普利高津耗散结构理论所揭示的开放系统的常非均衡态形影相伴，在此意义上，开放性即意味着非均衡性。其次，透过非均衡的表象，它还与耗散结构系统未来发展的涨落、分岔、不确定、难以预测、新奇创生、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等复杂属性，也有难解难分的相互作用。再次，基于其与上述各种属性的相互作用，它实质上与开放系统的非线性、不可逆、不可还原等复杂属性形成自缠绕，以至于当人们说到某系统具有开放性时，不啻就是说它具有复杂性。而一旦人们意识到它们都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属性时，也就意味着人们对其确定性信仰的终结（Pringogine,1998）。此外，适应性作为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又一基本属性，也与复杂性息息相关。讲到适应性，人们不禁马上会想到自组织生成、开放、选择、竞争、学习、试错、调整、创新、多样、差异、协调共存等与复杂性直接相关的概念。实际上，市场经济就是在与“传统”或“命令”等组织经济生活的其他方式相比较，显示出其更具有适应性之长处，才逐渐生成、存在和发展的。按照以研究复杂性科学著称的圣菲研究所的代表人物的说法，就是“适应性造就复杂性”（Holland,2000）。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作为自组织生成的、开放的、具有极强适应性的社会经济巨系统，生来就有复杂性。不仅如此，在其存在和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复杂性也如影随形，是须臾不可或缺的。其道理却并不复杂，非设计性、开放性、适应性及其包含的非线性、不可逆、非还原、创新、选择、非均衡、难以预测、不确定等因素，不仅不可能在此过程中缺失（舍此就会丧失其自身的基本规定性而转化为他物），反而只能在此过程中愈益复杂化，直到市场经济体系由于其不可抗拒的内在外在的否定因素而走向灭亡。在此意义上，非人工设计的、具有与生俱来且愈益增强的复杂性的市场经济体系，除辩证法规律所揭示的任何事物都不可抗拒的灭亡之“宿命”外，始终“目标不明”（Hayek,2000, p84）因而始终在路上。

三、市场经济：属人演化的复杂系统

市场经济虽然是自组织系统，却与自然界其他的自组织系统有所不同，其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自组织的属人系统。市场经济乃是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自发生成的经济体系，是人在有意识地满足自己需要的实践活动中“集体无意识”地生成的自组织系统。人，姑且不论他出于完全利己动机还是非完全利己动机，具有无限理性还是有限理性，始终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目的（或“归宿”），没有人或缺失人就无所谓市场经济，换言之，市场经济具有属人性，这或许也是不争的事实。

市场经济作为自发生成的属人系统，不能不包含人的诸多属性。而其中对该系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人基于其社会实践属性的自觉能动性。“自生成系统是惊人的二律背反创造物。”（Briggs,Peat,1998, p285）人，诚如先哲所言，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他的智性与兽性、理性与非理性总是交织在一起，并始终或隐或显地影响其选择和行为。人的兽性、非理性与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相应（事实上人性的这一方面也是市场经济自发生成的重要因素，并且其后也一直发挥重要作用），他的智性、理性

却与其自发性相悖。这样，对于市场经济而言，一方面是因其自然生成而固有的非设计性、无总体目的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的参与进而要对其加以理性控制而生成的有计划性、具体目的性（向人所需要的目标如均衡、帕累托最优及其改进收敛），而两方面的对立与协调，就成为这个属人自组织系统的基本矛盾之一。

市场经济虽然与自然界其他的自组织系统有所区别，但在复杂性上却不仅与之相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作为自组织系统，市场经济具有自然界非设计的开放系统的所有复杂性，而属人性又使它比其他自组织系统生成出更多维数^a因而变得“更复杂”。具体说来，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理性控制之维生成的复杂性。人有理性（包括“经济理性”），此乃人高于其他动物的优势力量，也是人控制自然和社会的本质力量。然而，伴随着具有自觉意识的人在其实践活动中的生成，也生成出属人世界与自然世界、主体之间及其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等自然界中原本没有的对立与协调问题。这些问题体现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就是不同人的经济理性或目的性之间及其与市场经济的自发性或非设计性的对立和冲突，以及由此而产生诸多矛盾。诸如个体理性经济人之间的具体目的的矛盾，不同经济群体之间的具体目的的矛盾，不同国家或政府之间的具体目的的矛盾，个体理性经济人、经济群体、国家政府彼此之间的具体目的的矛盾，以及上述有目的的个体和群体与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不仅是非线性的、不确定的、非还原的，而且是主动生成的、自缠绕的、因人因事而异的、难以均衡的，因而是更复杂的。再进一步，因为人有理性，从而能够认识进而利用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伴随着人利用规律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功，运用规律驾驭自然和经济活动逐渐内化为人们对其进行理性控制的内在冲动，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人的“文明化本能”。然而，实践证明，由于不得受社会历史条件和自身认识能力的永恒制约，人的理性只能是有限的，他对自然、经济的规律的认识水平和利用程度也只能是有限的。如波普尔所说：“科学是可以有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

（1987，“作者前言”，p1）而当人们执迷于工具理性和理性建构的“无限”力量，沉溺于驾驭规律改变自然的成就时，就会忘记理性的力量还在于批判性反思和纠正错误，忘记不知道的也是不能设计和控制的，进而陷入“致命的自负”之泥潭（Hayek,2000）。^b况且，自然界和自然规律、经济规律永远不会主动满足人的需要，特别是，规律只在“否定”意义上具有绝对性（如人总是要死的，不可能造出永动机，天上不会掉馅饼等），而在“肯定”意义上只是规范了一个可能性空间，可是人的有限理性不可能完全把握这个可能性空间，他往往乐于追求他所喜欢的那些可能，而它们往往不在规律规范的可能性空间之内，此乃人的各种失误的基本源泉之一。这样，市场经济又为自己平添了难以避免的人为错误之维，因而变得更复杂。

其次，价值选择之维生成的复杂性。与动物之本能的需要和选择不同，人的需要

a 现代复杂性科学乃至常微分方程系统的研究都表明，混沌现象产生的必要条件是系统的维数必须大于或等于三。在这里则是说市场经济系统的维数高于自然界的其他自组织系统因而更复杂。

b 表面上看，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似乎只是批判计划经济的，实质上，他所批判的“理性建构主义”也针对新古典范式的静态均衡分析。（参见冯杨、周呈奇，2005）

是自觉意识到了的需要，而且其需要是多方面的，包括物质的、精神的、道德的、人际交往的等等，从而其选择也是在特定价值观指导下的自觉选择。无可否认的是，人们的需要、价值观及其选择具有些许共性或统一性、同质性的一面，同样无可否认的是，人们的需要、价值观及其选择还具有更多特性或多样性、异质性的一面。正像后者无法根本否定前者一样，前者也无法根本否定后者。可一旦涉及实际问题时，人们更多的是要面对后者。市场经济活动是人们自觉追求利益的活动，其中，“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Marx,1956, p82）众所周知，在绝大多数场合，人们很难就利益问题达成共识或形成统一标准。因为，从历史和现实中看，“利益”基本上是不讲道理的，单靠逻辑论证和耐心说服大多无济于事，解决根本利益分歧的主要途径或许在于力量。而任何利益集团无论有多么强大的实力，也不可能迫使每个人都心悦诚服地接受其利益标准，对于在市场经济中生成了主体性意识的个人而言尤其如此。这样，不同利益的对立与协调，包括个人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等，就成为极复杂的问题。此外，人作为社会性存在，还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生成了惟人独具的调节人际关系的道德观念体系。在以调节人际物质利益关系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为什么也追求社会声誉，讲究诚信，赞誉美德？因为遵循这些规范，至少能减少交易成本，并且从长期看会给人们带来好处。在此意义上，道德最终可与效用等价。（参见Smith,1997, p233-241）。然而，和效用相仿，道德观念也有因人而异的一面，因而在规范和评价经济人的行为时，也会出现多样、差异、不确定、难以强行统一等复杂属性。因为，由“自爱”派生的“利己心”和“同情心”，同样具有自缠绕（或“迭代”）的复杂性，并导致人的经济行为始终交织着“利己”与“利他”的自缠绕。况且，基于自觉的需要、预期、利益诉求、价值观、道德规范、规律制约等有限理性，同时不排除基于情感、意志、激情、直觉、顿悟等非理性，人的选择在复杂性上也远远超出动物“趋利避害”的本能。如果说自然界其他自组织系统只遵循物竞天择的法则，那么，市场经济这个属人自组织系统中则又多出了人的自觉抉择之维。就人的自觉选择而言，若仔细分析，其复杂性即令人瞠目。动物本能的“趋利避害”选择，只是针对眼前的、即时的情景，而人的自觉选择则不仅针对现在，而且还联系着过去和未来。一方面，它包含过去所有知识的积淀和对未来的预期，另一方面，它还包含非理性因素乃至某些细微末节的影响。关键时刻切不可忽视那些细微末节，因为“最小的波动也能在不同的进化道路之间作出决定性的选择。这种混沌的、非经典地决定的过程被称之为系统‘分岔’。”（Laszlo,2001, p81）更进一步，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人还不能不对自己基于有限理性或非理性而做出的选择进行评价，而评价又会与上述有限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形成自缠绕，并直接影响经济人今后的选择和行为，从而为这个属人自组织系统的复杂性增添了新内容。

再次，工具创新之维生成的复杂性。人在自己的生成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物质工具系统（“硬件”系统）和语言文字系统（“软件”系统），是宇宙演化史中的奇迹，并且为大自然增添了不可忽视的工具之维。由于创造并运用工具系统，人成为自然界中最强大的物种。工具系统的生产和不断扩大的、创新的再生产，对市场经济的生成

和演进起到重要作用，^a其功能也在市场经济体系生成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挥，并对其进一步演化产生不可或缺且难以预测的影响。鉴于物质工具系统的创新功能昭然若揭，此处仅着重分析语言文字这个“软件”系统的巨大创新功能及其复杂性。语言文字系统是惟人独具的创造，是伴随着人生成的最具新奇性的、自然物不可能自发生成的“符号”系统，其内在结构及其所包含的“意义世界”中各个要素的相互作用、关联、迭代、自缠绕、超越、新奇创生等，均与人的自觉意识不可分割，因此和人的大脑一样，堪称臻至复杂性之化境。卡西尔指出：“真正的人类符号并不体现在它的一律性上，而是体现在它的多面性上。它不是僵硬呆板而是灵活多变的。”“人在掌握语言的过程中总是持一种能动的创造性的态度。”（Cassirer, E., 1985, p47, p285）依托语言文字系统或“符号”的“客观知识”或“世界3”，既与“世界1”（物质世界）和“世界2”（精神世界）有复杂的相互作用，而且其自身也有独特的演化过程，该过程本身的显著特点，就是难以预测和控制的新奇创生。（Popper, 1987）一定意义上，现代市场经济的一切创新，都与世界3的发展息息相关。“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等概念的滥觞，以及媒体广告、网上银行、电子商务的强势，就是这种内在关联的反映。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信息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对于盈利和创新而言都是如此，而市场经济固有的信息不对称、不完备、“白噪声”等，又为选择、评价、决策、创新等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难以预测、难驾驭等复杂性。创新是市场经济演化发展的不竭动力。拉兹洛说：“进化不是命运而是机遇，未来不是预见而是创造。”（2001, p2）然而，机遇可遇而不可求，创新则难以预测或控制，其复杂性显而易见。迄今为止，市场经济是使个人分散知识得以充分运用于创新的最有效机制，而人本身就是自觉超越的存在，市场经济生成后此特点更为凸现，因为，如哈耶克所言：“人性有着无限的多样性——一个人的能力及潜力存在着广泛的差异——乃是人类最具独特性的事实之一。”（1997, p103）而个人能力和潜力的无限差异，分散知识的无限多样，符号及其意义组合的无限可能，知识增长的无限开放，加上它们在市场经济这个开放系统中相互组合而形成创新的无限前景，不能不使市场经济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其它自组织系统。

若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业已生成的其他市场经济模式^b相比，就会看出它既有其共有的复杂性，又有自身特有的复杂性，堪称“最复杂”的系统。对此至少可作如下简要分析。其一，实践创新之维生成的复杂性。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价值观与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相关理念，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现实地开拓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实乃人类文明史上的空前创举，其新奇性恐怕任何人都难以否认。同样毋庸赘言的是，它既与英法美等国原

a 回忆一下蒸汽机、电话、无线电、电灯、汽车、飞机、电视、原子能、计算机、高速公路、互联网、光缆的发明运用，牛顿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和《国富论》《资本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影响，以及指南针、纸张、印刷术、火药对市场经济的催生作用，就不难理解该论断。

b 英国一批学者（包括肯特大学的David McLellan、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Chris Brown和Mick Cox、剑桥大学的Gareth S. Jones、诺丁汉大学的Christopher Pierson、爱丁堡大学的Russell Keat、贝尔法斯特英国女王大学的Vincent Geoghegan和Shane O'Neill等教授）认为，当代世界的市场经济可分为美英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德法为代表的欧洲大陆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等，而中国正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独特的市场经济模式。（参见杨宗丽等，2005）

生态的市场经济有所不同，又与日韩新等国非原生态的市场经济有所不同。其中最为显著的差异，就是社会主义固有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价值观及其制度安排与市场经济固有的为个人谋利益的价值观及其制度安排的冲突。（Wang Xiao-lin,2002）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利用市场经济高效率配置资源的功能，又要防止不可逆的恶性两级分化的出现。因此，如何解决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实现令大多数人认可的“均衡”这个世界历史性难题，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就具有空前的复杂性。其二，历史传统之维生成的复杂性。在诸多历史传统中，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自然经济传统的“小农习俗惯例之维”和计划经济传统的“看得见的手之维”生成的复杂性。所谓小农的习俗惯例，包括长期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小农的观念、意识及其与之相匹配的制度、规则和潜规则。一方面，其自发性、利己性、精于计算性等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不谋而合；另一方面，其无组织性、非效率性、非议差异性、因循守旧性、缺乏法治意识、热衷于以潜规则解决争端等又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格格不入。尤其是无组织性和法治观念的匮乏，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克服的巨大障碍。而真正改变人们的观念、习俗，无疑也是人类社会最复杂的难题之一。此外还有“看得见的手之维”生成的复杂性。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脱胎于计划经济，数十年计划经济的集中管理乃至数千年大一统的人治惯例，不能不对其产生深远影响。其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或许并不在于政府调控是否必要，而在于政府是以“法治”还是以“人治”的形式来实行调控。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型，涉及既得利益、观念意识以及制度的设计、安排、实施等极为复杂的问题，这将是一个空前复杂的过程。其三，“时空紧缩”之维生成的复杂性。当中华民族历经一百多年的奋斗，向世界宣布自己重新站起来时，以市场经济为典范的现代文明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体系。中华民族不得不直面与现代文明存在较大差距的严酷现实，不能不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发达”的现实基础出发，并且在急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内在驱动和先进的现代文明的外部挤压的双重压力下，开始自己向现代化进军的艰难进程。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宣布力争在建国一百年时初步实现现代化。这就是说，中国打算用实际七十年（1979-2049）左右的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往往耗费二、三百年才走完的路。而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绝无可能以战争或海外殖民地方式而只能以“和平与发展”方式的约束条件下，解决诸如资本的原始积累、两极分化的有效遏制、城乡二元结构的消解、人均GDP的较高指标、国民素质的现代化、脑体分工的逆转、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建构，乃至中国特有的巨大的人口总数及其带来的就业压力以及“三农”等高难度问题，其复杂性将是空前的。

总之，市场经济之所以更复杂，归根到底是因为属人的新维度使它的总维数高于自然界其他的自组织系统，生成了理性控制与非设计性等自然界原本没有的诸多新矛盾，从而使市场经济在复杂性程度上高于其他自组织的开放系统。而市场经济自发或非设计的本性既与人的非理性方面相符，又与人的有限理性方面（即利用它满足自己需要而生成的对其加以理性控制的“文明化本能”）相悖，它们始终处于对立或冲突状态之中，二者的张力乃是市场经济不断演化的根本动力。

四、新古典范式：“物理学艳羨”的尴尬

面对具有如此复杂属性的市场经济这个属人的自组织系统，至今仍占据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范式，却一直坚持牛顿经典力学范式的分析传统，将它类比于某种“主动”趋于均衡的热力学系统来研究。按照多普菲的说法，“从资源均衡出发，对市场秩序的力学表述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标志。”（2004，p3）何梦笔深入剖析生产函数和理性预期之后也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由于“假定均衡是（经济）世界的正常状态，否认心智具有任何非偶然的因果相干性”，因而是“无心智的经济学”。（参见Dopfer,2004，p86-91）习惯于牛顿力学的线性确定、时间可逆等还原论思维定势，过分迷信均衡优化的数学工具，使得新古典范式出现了复杂性思维的缺失。本来，运用理性思维和“奥卡姆剃刀”，将研究对象的复杂情况简化为若干最基本的要素，进而建立理论的或数学的模型，揭示其运动规律，乃是任何理论研究都在遵循的简单性原则，经济学自然也不例外。可问题在于，简单性原则无可非议，简单性思维就值得商榷了。例如，从马歇尔局部均衡分析法到现代博弈论分析法，基本上是把对象界定在“二体对弈”（消费者与厂商，或委托人与代理人）的范围之内，因为优化理论只能处理二体问题。然而，经济生活的现实是复杂的，市场经济的维数是多元的，二元化思维不能真实地反映复杂的现实生活。老子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数学模型一旦进入三体问题的分析，不存在解析解、无法进行简单的系统的叠加来近似的“不可积性”便凸显出来。（Wang Xiao-lin,2006）而“三”这个数字似乎是复杂系统的一个关节点。现代复杂性科学乃至常微分方程系统的研究都表明，混沌现象产生的必要条件是系统的维数必须大于或等于三。（Chen Ping,2004，p454-464）混沌经济学的研究也表明，周期3即意味着混沌。（William J. Baumol, Jess Benhabib,1996；参见Day,1996，p63-67）在这里，“二”与“三”的区别不在于是否遵循了简单性原则，而在于是否引入了复杂性思维。

罗伯特·戴罗尔姆（Delorme,R.,2005）将新古典范式遵循的“分析性建模的经典公理体系”与“复杂性建模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前者主张“可以通过三个公理对实在进行分析性的建模。A和B代表命题或实体。1、一致性：A即A。2、非矛盾性：A不能同时既是A又是非A。3、排中律：不存在同时既是A又是非A的B。”后者则主张“对复杂性进行建模是建立在四个原理之上的。1、关系：基本现象是在相异的A和B之间的某种关系。2、一致性：对于给定的关系来说，A即A。3、非否定性：在原理2的条件下，A不能同时既是A，又是非A。4、含中律：对于给定的A和非A，存在既是A又是非A的C。”（参见Foster,M.,2005，p94）二者的区别在于：其一，前者认为研究的对象仅仅是命题和实体，后者则认为是它们自身之间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其二，前者仅仅承认对象有其确定性的一面，并据此来把握对象，后者则在此基础上还确认其不确定性一面的存在，并在承认确定性的基础上同时依照对象固有的不确定性一面来把握对象；其三，前者只是坚持形式逻辑，后者则在承认这个基础上同时坚持辩证逻辑。二者的联系是：其一，后者在上述“三点区别”中均包容了前者；其二，均坚持“一致性”，但后者在这一点上也包容了前者。不难看出，前者坚持的是绝对、不变、

演绎、确定的研究范式，并得到传统哲学“两极对立，非此即彼”因而要“争第一”的
本体论思维方式和经典力学范式的支撑，后者坚持的则是绝对与相对、不变与变、演绎
与归纳、确定与不确定相统一的研究范式，并得到现代哲学“对立统一，矛盾互补”因
而要“求统一”的实践论（或曰关系论）思维方式和复杂系统科学范式的支撑。

（Wang Xiao-lin,2004）二者相比，由于前者更易于处理因而较简单，而后者则较难
处理因而更复杂，因此，二者的区别说到底是简单性思维与复杂性思维的差异。

戴罗尔姆（Delorme,R.,2005）认为，“经济学内部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经典逻辑
作为其最终基础的公理体系的一致性问题展开的，这种一致性的缺乏仍是主流对异
端的主要批评。”（参见Foster,2005, p94）彼得·M·艾伦（Allen,P.M.,2005）进一步指
出：“过去，对可处理性的期冀导致了诸如均衡这类非常强的假设。”（参见Foster,
2005, p345）众所周知，“一致性”和“可处理性”乃是新古典范式对“异端”的基本非
议。然而，若认真分析则不难看出，这种非议本身并不是无可非议的。首先，新古典
范式坚持的一致性只局限于数学演绎推理的逻辑严谨性，而严谨的数学推理只能确
保逻辑之真，却难以确保事实之真，可是新古典模型的数学演绎一致性恰恰是以牺
牲其与经济现实的一致性为代价的。其实，最为严谨的数理逻辑是“刚性的”，容不
得哪怕只是极为微小的弹性。而现实的经济活动虽然确有规律，其逻辑却是带有“弹
性的”，容许各种偏离、误差甚至佯谬。这样一来，新古典模型的逻辑刚性与现实经
济活动的“逻辑弹性”就处于尖锐的冲突之中，人们愈是强调其经济模型的逻辑刚
性，就会愈偏离充满弹性的经济活动的现实。其次，新古典范式坚持的可处理性其
实反映的是它的人为选择性，这恰恰与其弘扬的“客观性”形成鲜明反比。所谓“可
处理”，就是要在一个规范的分析框架中研究经济问题，即“1、界定经济环境；2、
设定行为假设；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结果；5、进行评估比较。”其研究方
法还要求“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参照系，给出度量标尺，以及提供分析工具。”（Tian
Guo-qiang,2005）显然，该分析框架所涉及的“界定、设定、给出、选择、评估”，
以及其研究方法所涉及的“提供、建立、给出、提供”等七个核心动词，它们所描述
的现实行为均带有人为性质，并且都与主体基于其素质、学养、境遇、实践经历、
社会集团归属以及信仰、情绪等所作的抉择内在相关。可处理性关注的实质是简
单性，无论多么复杂的现实情况，一旦被纳入这样的框架，并辅以这样的方法，自
然会变得“简单”起来（其中绝不排除使用相当“复杂”的手段）。然而，“一种非
常简单的描述是否仍有充足的现实性以以至于是有用的，这是全部问题所在。”
（Allen,P.M.,2005；参见Foster, 2005, p345）说到底，新古典范式坚持的可处
理性实质上是基于人的有限能力（可操控、易操作、能驾驭等）且符合人的意愿
所做出的“简单性”选择。不过，其合理性与局限性均在于此。实事求是地确认人
的理性和认知能力是有限的，通过竞争和供求博弈可以自动趋于均衡是市场经济
固有的功能，而趋于进而实现均衡既符合人的需要又恰恰是经济学家“可处理”
的，因此，只要人们不舍弃对市场经济进行理性控制的“文明化本能”，新古典
范式及其均衡论的“简单性”基本假设就具有恒久的魅力。但是，由于新古典范
式实质上只考虑人的意愿与有限能力，这样一来，既与其宣扬的纯粹客观性原则
背道而驰，从而在其逻辑的一致性及其科学性上出了问题，又与市场经济固有的
复杂性一

面不相符合，从而在其与现实的一致性及其适用性上也出了问题。关键是，新古典范式只是分析市场经济运行中符合人的意愿且易于把握的简单性一面，却无视其固有却未必符合人的意愿且难于把握的复杂性一面，这或许是其根本缺憾之所在。

弗朗西斯科·洛卡（Louca,F.,2005）指出，由于“混沌不受某种较低维数的吸引因子的特殊模型的约束——某个静止点或稳定增长，使它成为经济学中非常不受欢迎的发展分支。这样就存在一种悖论：尽管经济学的最大化范式来自物理学，但是现在最新的混沌理论和复杂性科学正在物理学领域快速地发展，这对经济学认识论层面具有特殊的意义。”（参见Foster, 2005, p281）而新古典范式却以高傲的沉默对其不屑一顾。布洛克（Brock, 1991）将此状况称之为经济学“物理学艳羡”的窘境。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森（Anderson, 1988）和著名物理学家鲁勒（Ruelle, 1988）在1987年圣塔菲会议上也略带调侃地批评新古典范式的均衡概念，指出“物理学的观点与经济学家所进行的假设之间是不同的。”（均参见Foster, 2005, p291-292）

五、未划句号的结语

市场经济复杂性的现实存在向新古典范式提出挑战，揭示了该范式与市场经济本质属性的背离，华尔街金融危机更凸显了其背离。说到底，新古典范式只代表了人们试图以经济理性控制市场经济运行的愿望，但是，市场经济复杂性本质上的不确定性却使这种愿望不断破灭。华尔街金融危机的重要启示之一或许是：主流经济学家运用新古典范式无法解释其生成和蔓延，也难以依据它提出有效的应对良策；经济学主流观点及与其彼此呼应的经济政策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两极弹跳，使新古典范式引以自豪的“客观性”、“科学性”成为“皇帝的新衣”，而“简单的”新古典范式与复杂的市场经济愈益相背离的致命缺陷更加暴露无遗，其理论学说的“系统性风险”正逼近全面爆发的边缘。西方经济学的此类教训，足以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以为戒。

“变是永恒的，不存在不变的事物。”（Wallerstein,1998, p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固守简单性思维范式，仍然坚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约束下“以不变应万变”，还是直面复杂性挑战，在把握变化中与时俱进，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毋庸置疑，市场经济表象上有其通过竞争和供求博弈趋于均衡的“简单性”的一面，但非设计性、属人性、非均衡性、非还原性、不确定性、难预测性也是这个开放的自组织系统的本质属性，它还有其复杂性的一面。在市场经济生成、发展直至灭亡的全过程中，前者只是特殊的、非常态的，后者则是一般的、常态的。既然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就不能不正视并深入探讨其复杂性方面。时代已经进入21世纪，经济学正孕育着新发展的契机，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立统一，矛盾互补”中“求统一”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和复杂系统科学已经提供了一批更有用的工具，启示人们摆脱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两极对立和跳跃的思维定势，根据市场经济的复杂性现实探索理论研究的新路径。一句话，对市场经济而言，最为确定的是其复杂性导致的不确定性，而“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均为人之手，伴随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本

质属性和运行规律把握得愈益自觉，“看不见的手”就会愈益以“看得见的手”之方式得以体现。人们只要跳出“致命的自负”的陷阱，关注量子力学泰斗玻尔(Niels Bohr)所说的“站在一条深刻真理对的另一条深刻真理”，在经济学现成的概念箱子中加进上述新理念，建构一个新概念箱子，就会促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升华到一个新境界。

参考文献

- [1]伯格森.创造进化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2]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第1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 [3]布里克斯,皮特.湍鉴——混沌理论与整体性科学引导[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 [4]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 [5]陈平.陈平集——封闭·冲击·演化[C].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 [6]陈平.文明分叉、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7]崔之元.“看不见的手”范式的悖论与当前金融危机[J].21世纪经济报道,2008-9-27.<http://humanities.cn>
- [8]戴等,理查德.H.混沌经济学[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 [9]多普菲编.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 [10]杜普莱西斯.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 [11]恩格斯.致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2]冯杨、周呈奇.市场秩序与政府干预——哈耶克的解读及其对新古典的批判[J].南开经济研究,2005(5).
- [13]福斯特,梅特卡夫主编.演化经济学前沿——竞争、自组织与创新政策[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 [14]郝柏林.复杂性的刻画与复杂性科学[J].科学,1999(3).
- [15]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北京:三联书店,1997.
- [16]哈耶克.致命的自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17]霍兰..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 [18]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
- [19]克鲁格曼.克鲁格曼的预言——美国经济迷失的背后[C].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 [20]拉兹洛.微漪之塘——宇宙进化的新图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21]刘明远.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美国次贷危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11).

- [22]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 [2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24]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25]苗东升.论复杂性[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6）.
- [26]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7.
- [27]普里高津.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98.
- [28]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29]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C].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 [30]斯基德尔斯基.别了，新古典主义革命[J].2008-9-23，<http://humanities.cn>
- [31]斯密.国富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 [32]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33]斯蒂格利茨.如何防范下一个华尔街危机[J].2008-9-19，<http://humanities.cn>
- [34]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113-125.
- [35]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 [36]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 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 [37]王晓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饱含实事求是智慧的明智抉择[J].现代财经，2002,(2).
- [38]王晓林.“争第一”抑或“求统一”——实践论思维方式及其对经济学研究的启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 [39]王晓林.经济学范式：逻辑困惑、现实悖论及其可能出路[J].经济评论，2006（2）.
- [40]杨宗丽、杨明伟、谢凡.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认识[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11）.
- [41]张作云.金融危机的根源、生成机制及其在我国发生的可能性[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11）.